

老上海

城厢掌故

薛理勇 著



老上海

城厢掌故

薛理勇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上海城厢掌故 / 薛理勇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5. 8
(薛理勇新说老上海)
ISBN 978-7-5458-1111-7

I. ①老… II. ①薛… III. ①上海市—地方史—掌故
IV. ①K29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54757 号

责任编辑 沈佳茹

技术编辑 丁 多

装帧设计 郦书径

老上海城厢掌故

薛理勇 著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1/32
印 张 6.875
字 数 140,000
版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58-1111-7/K.188
定 价 25.00 元

前言

汉字很有趣,“邑”在古文字中写作,上面的“口”表示一个有围墙相围的区域,下面的“巴”像一个踮踮的人,合在一起就表示有许多人居住在一起的安居乐业的城镇、城市。古代,战争频繁,有的部落或侯国可以通过战争掳掠奴隶,抢夺财富,为了保卫自己的“邑”,人们就在邑的四周建造高大、牢固的城墙,所以,“城”的本义就是邑的城墙,后来引申而指城镇、城市。“城里为邑,城外为郊,郊外为野”,有了城墙就有了界线,城的里面才是“市区”,城的外面就是郊区,远离城里的地方就是穷乡僻壤。

城市的人口、经济是会不断发展的,如城墙不倒的话,那么,邑的区域只能局限于城里,人们只有冲出城墙,到近郊发展。在汉语中,“厢”本来是指建筑中位于正殿、正堂两侧的偏殿、偏房,如民居中客堂两侧的房屋或房间称之“厢房”,“邑里为坊,邑外为厢”,“厢”就是城外人口密集并有一定商业活动的区域,当然,所谓的“城厢”就是指城和厢,也就是城里和城外人口居住集中的区域,这一点一定要认清。

上海是元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 1292 年置县的,由于许多原因,

上海在建县后的二百余年并没有筑城,所以上海是一个“有邑无城”的邑城,也是一个不设防的城市。明朝中期,中国近海倭患严重,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上半年,上海多次遭倭寇抢劫,掠去财产无数,损失惨重,于是才开始筑城,并于当年筑成。上海城墙周九里,于是,一道城墙就确定了上海邑和郊,邑和厢的区域。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军收复台湾,标志着沿海反清武装被肃清,两年后,康熙颁“弛海禁”令,结束了中国自明初开始的近海禁运政策,上海港的中心,即东门外与黄浦江之间的狭长地块成了繁忙的码头作业区和商业区,时人作竹枝词咏“一城烟火半东南,粉壁红楼树色参;美酒羹肴常夜五,华灯歌舞最春三”,在上海邑城外的东南部形成了“厢”,上海的城市面积不断扩大,城市人口不断增长,城市经济不断进步、发展。

上海也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在1843年12月17日上海开埠后十年,上海的外贸总量超过广州而成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上海也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最早设立租界的城市。西风东渐,使上海从一个中国传统的城市蜕变为“十里洋场”,上海也是一个移民人口最多的城市,华洋杂处,五方杂处,变异的速度远大于遗传的能量,在上海开埠五十年后,上海就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国际性的大都会。人们津津乐道于灯红酒绿,光怪陆离的“十里洋场”,上海的老城厢逐渐被人们淡忘。实际上,在上海城市发展历史上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直到今天,老城厢还保存着许多文物古迹,这些都是上海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记录,发掘历史就是要尊重自己祖先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希望这本小书,能为发掘,研究,传承上海文化起一点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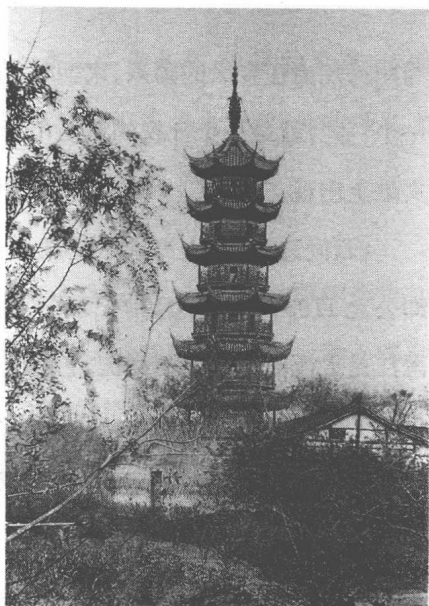
目 录

- 1 前言
- 1 上海名称的来历
- 5 关于上海建县年份
- 12 从青龙镇到上海县
- 18 沙船与上海港
- 26 倭患与上海筑城
- 31 上海城墙与城门
- 39 上海拆城和城墙砖
- 46 上海县衙门在哪里
- 53 上海的校场和旧校场年画
- 60 设在上海的分巡苏松太兵备道
- 66 约约乎 皮老虎 小东门 十六铺
- 74 一城烟火半东南——城外的商业街
- 84 从马路工程局到上海城自治公所
- 91 中国最早的警察学校和警察机构
- 97 为光绪亲政而建的万寿宫
- 102 小南门的救火联合会钟楼
- 108 上海的南火车站

- 112 关于上海江海关的故事
- 121 上海的善堂
- 130 上海最古老的天主堂
- 142 老城厢的基督教教会学校
- 149 民立上海中学到上海民立中学
- 158 吴馨其人与务本女校
- 164 从日涉园到书隐楼
- 175 上海名园露香园及顾绣
- 184 上海的天后宫
- 202 上海的关帝庙
- 208 清代老城厢的三大名庵

上海名称的来历

要认识、了解一个城市,也许,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城市的名称是怎么来的,有什么故事和文化上的意义,对上海也是如此。在本《丛书》的多本书中提到,在西晋以前,今上海地区泛称华亭或云间,这个地名与三国时期东吴豪门陆逊与他的孙子陆机、陆云有密切的关系,一直到唐天宝十年(751年),原华亭地区的编户已超过一万二千户,而根据当时的制度,编户超过六



上海近郊的龙华塔

千户就属于壮县,于是根据吴郡太守的奏请,分昆山县的南部、嘉兴县的东部、海盐县的北部设置华亭县,这也是今天上海地区有独立县的行政设

置的开始,对以后上海地区经济发展很重要。

“上海”地名的出现不知始于何时,《宋会要辑稿》是根据宋朝皇家档案编著的,史料真实性和可靠性很高,该书《食货十九·酒曲杂录》中有这样一段记录:

秀州,旧在城及青龙、华亭……上海……十七务,岁十万四千九百五十二贯,熙宁十年(1077年),租额一十一万七千八百九贯七十三文。

秀州的州治在今天的嘉兴,宋朝时,华亭县隶属秀州,而“上海”还只是一个“务”,就是一个征税的贸易市场。这也是“上海”这个地名最早在文献上出现。至于“上海”地名的来历及文化意义,并不见著录。

《云间志》是今上海地区的第一部地方志,纂成于南宋绍熙四年,即公元1193年,该《志》中记录“上海浦,在县东北九十里”。古代,吴淞江是太湖流域最大的河流,它从太湖发源,东流直泻大海,在入海口形成一个喇叭形的三角洲,古人称之“沪渎”、“沪海”,因其在华亭县境内,又称之“华亭海”,据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卷十九·水利下》引著名水利专家郑侨的话说:“吴松古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古人的治吴淞江水利办法,就是沿吴淞江每隔五里或七里,疏浚或开凿一条吴淞江的大支流,来分担吴淞江的排洪和蓄水能力,这样的河流统称之为“浦”,直到今天,太湖流域称“浦”的河流特多,而且多为吴淞江的支流,如赵屯浦、大盈浦、桃浦、彭浦、周浦、杨树浦等。《云间志》讲的“上

海浦，在县东北九十里”是指在华亭县城，即距今松江城厢镇九十里，这个距离大致上就是今天的上海老城厢附近，于是，后人大多认为，上海就是以位于上海浦滨而得名的，这也是讲得通的。但是，上海可以是以位于上海浦边上而得名的，也可以理解为上海浦是以上海得名的，那就是一个讲不清的问题了。

明《弘治上海县志》也是上海较早的地方志，该志卷一《沿革》中记：

上海县，称上洋，海上旧名华亭海。当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府……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故也。

古文没有标点，于是在理解古文时会产生异义，上面引文中的注文如将其理解为“称上洋、海上”，那全句就应该理解为“上海县又称上洋和海上，旧名华亭海”，直到今天，“上洋”和“海上”仍作为上海的别名使用；如果中间不点断，理解为“称上洋海上”，那意思就变了，全句就应该理解为“上海县，又称‘上洋海上’，旧名华亭海”，在上海方言中，“上”缀于词末念如“浪”，义同上、上面、这里，如“床上”叫作“床浪”，在地名中则多以方言音读作和写作“浪”，应理解为“这里”，以前上海地名中有所谓金家浪，汤家浪，此“浪”即“上”的土音，所谓金家浪就是金家宅这里一带，今杨浦区有“高浪桥”，后多作“高郎桥”，该地旧名“高

家浪”，桥名本作“高家浪桥”，后省作“高浪桥”，那么“上洋海上”就应该是“上洋海浪”，全句就可应理解为“上海县，又称‘上洋海浪’，旧名华亭海”，也就是讲，“华亭海”是较早使用的地名，后来当地人把“华亭海”叫作“上洋海浪”，而“上海”就是从“上洋海浪”的缩略语而得名的。我无法断定这两种释法哪一种更接近事实，反正，关于“上海”地名来历与现实没有太大关系，其文化上的意义更大，多一种故事，多一种传闻，多一种考证，也就是多了一些文化意义。但是，这一种说法就恰恰证明——上海不是得名于上海浦，而是上海浦得名于上海。

关于上海建县年份

县的繁体为縣，在《说文解字》中写作, 并列入“𡩊部”。《说文解字》“𡩊，到眚也。”“到”即“倒”，“眚”即“首”，就是人的头，古人把被砍下来的人头叫作“首级”，所谓“倒首也”可以理解为“被倒挂的首级”。“縣”字见于金文，写做, 字形很清晰，由 (木)、 (系)、 (首)合成的会意字，像把砍下来的首级用绳子倒挂在树上，古代，军队或政府为了震慑敌人或老百姓，会把敌人或罪犯的头砍下来后挂到树上，即成语所谓的“枭首示众”。《说文解字》：“縣，系也。从系持首。”段玉裁《说文解字注》：

《周礼》：“县系于遂。”《邑部》曰：“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分为百县，则系于国。秦汉，县系于郡。”《释名》曰“县，县也，县系于郡也。”自专以县为州县字，仍别制从心之悬挂，别其音，县去，悬平。

周王朝国土面积很大,单靠中央政府是管不过来的,于是,就把国家划分成许多行政区,这种隶属中央控管的行政区就叫作“县”,就是取“县”有悬挂、挂靠之义。秦始皇实行“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的下面设“县”,从此,“县”的级别低于“郡”,是挂于“郡”下的行政区,后世就多仿“郡县制”。由于“县”已经成了行政区的专用名词,后人就另外造了一个“县”下加“心”的“悬”,从此,“县”多用于行政区划单位名称,其原义就失去了。人们也在读音上加以区分,“县”念去声,念 xiàn,而“悬”念平声,念 xián,而今又念作 xuán。这段文字与本书的正文关系不大,但其是古汉语知识,而且有趣,权当赘言补入正文。

从秦始皇推行“郡县制”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长期实行——中央政府、郡、县三级行政体系,古代,对于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设县是有标准和制度的,主要的参数就是人口或编户。古代中国的国土面积很大,但人口不多,一般讲,越是古代,人口越少,人口密度越低,所以,越是古代,一个县的人口越少,而面积越大。如唐朝制度,江南地区人口超过六千户的地方就可以或必须建县,在唐天宝十年(751年),原华亭地区的编户已达一万二千户,早就超过了建县的标准,于是根据吴郡太守赵居贞奏请,割昆山县之南境、嘉兴县之东境、海盐县之北境,置华亭县,这是今上海地区出现和建立的第一个独立的县级行政建置,这在上海历史上是一件重大事件。而当时的华亭县的面积很大,它大致相当于今天除嘉定区、宝山区、崇明县以外的全部上海市面积。

《元史·百官志》中记,“(至元)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万户之上

者为上县。上县秩从六品达鲁花赤(蒙语“长官”的意思)一员、尹一员、丞一员、簿一员、尉一员、典史二员”,而此时上海地区的编户已经超过三万,于是又分华亭县东北的五个乡置上海县。古代战争频繁,一般县城必须建造城墙,后来人们就把建县的年代称之“建城”的年代。1991年8月19日,几乎上海所有的媒体报道,这一天上海开展各种形式的纪念上海建城七百周年活动。问题在于上海的建县时间真的是七百年前的1291年吗?!

建县必须有一个过程,至少要经过地方申报、中央政府批准和正式挂牌的步骤。古代交通不便,上海距京城大都(今北京市)几千里,仅车马奔波传达文书就要花不少时间,当然,上海置县也会有一个过程。另外,现在中国的行政建置的设立年代一般以上级政府正式批准的时间为正式成立年代,但古代并无此强行的规定,有的以申报日期,有的以批准日期,有的以知县到任或县衙门挂牌日期,于是,关于上海建县年代就有不同的说法。《元史》是官方修的志,有权威性,《元史·地理志五》中是这样记录的:

松江府。唐为苏州属邑,宋为秀州属邑。元至元十四年升为华亭府,十五年改松江府,仍置华亭县以隶之,户一十六万三千九百三十一。至顺钱粮数。领县二:华亭上,倚郭、上海。上,本华亭县地,至元二十七年,以户口繁多置上海县,属松江府。

到了元朝、原华亭县的编户已经达到十六万余,远远超过元制“江淮以

南三万户之上者为上县”的规定,于是在至元十四年(1277年)升华亭县为华亭府,次年又改名松江府,府下只有一个华亭县,几年后,即至元二十七年又析华亭县之东境置上海县。至元二十七年是公元1290年。《嘉庆松江府志》采用了《元史》的说法,称上海建县是“(至元)二十七年从知府仆散翰文(蒙古人)之议”,这句话可以理解为:至元二十七年听从松江知府仆散翰文的申请批准的。

张之翰是松江知府仆散翰文的继承者,他为上海镇学升格为县学写的《上海县学之记》碑(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中是这样讲的:

至元辛卯,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甲午扁(编)县学。县尹周汝棹洎教谕诸执事。方营建未遑,遇圣上龙飞,首下崇儒之诏。明年改元,浙西廉访签司朱君思诚,按行是邑,适与余偕至。

张之翰是新任松江知府,他不至于把上海建县的年份搞错,而“至元辛卯”为至元二十八年,即公元1291年。赵孟頫(1254—1322年),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宋末元初人,家乡就在与松江相邻的浙江湖州(今浙江吴兴),元朝初年,元政权为稳定政权,大量起用地方文人担任镇一级和县一级的长官,他就担任过“青龙镇监”,而青龙镇原为华亭县下辖的一个重镇,当置上海县后,青龙镇划归上海县,明万历析上海县之西境与华亭县之东境置青浦县时属青浦县,并为青浦县治,后来青浦县治迁唐行,即今青浦城厢镇,青龙镇就被民间叫作“旧青浦”。赵孟

颀是著名书画家，也许他也曾参加过上海建县工作，他写的《大德建学记》中也讲上海“昔治以镇，至元二十八年始升为县”，他也认为上海建县是 1291 年。又，明《弘治上海县志·卷五·建设志》收顾或《图籍记》中也讲：“上海为松江属县，其为县，自元之至元二十八年始”。

唐时措是宋末元初上海人，参加上海建县工作，他的《上海建县治记》中说：

至元壬辰春，圣天主以华亭地广，民众难理，命分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五乡，凡二十六保立县。

又说：

初，主簿郝将仕首至，是年闰六月二十二日，卜廨莅事。

按唐时措的说法，上海建县是“至元壬辰春”，即至元二十九年春，也就是公元 1292 年，而这一年知县周汝楫并没到任，最早到任的是“主簿郝将仕”，所谓“主簿”就是主管文书的官，根据上引张之翰《上海县学之记》，以及《弘治上海县志·卷七·官守志》，周汝楫是至元三十年，即公元 1293 年才到任的。

据以上论述，那些参加上海建县工作的当时人对上海建县年代就有至元二十七年、二十八年，二十九年三种不同的说法，这并不是 yes or no 的非此即彼的命题，只是建县必须有申请、报批、批准、挂牌的步

骤或过程,仅程序就需花上几年,而当时并无确定建县年份的强行规定,有的人以申请日作为建县之始,有的以批准日,又有的以挂牌日作为建县之始而已,上述的三种说法均没有错误。对地方而言,建县有划时代的意义,建县日期就是建城日期,是一个“节日”或“吉日”,地方志会不断重复叙述。保存最早的明《弘治上海县志·卷一·沿革》中说:

上海县。称上洋、海上时名华亭海。当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至元二十九年,以民物繁庶,始割华亭东北五乡立县于镇。隶松江。

上海最早的《县志》选择、确定“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 1292 年为建县日期,后来历年修的《县志》,以及民国编的《上海市年鉴》等也均以“至元二十九年”为上海建县的日期,我长期从事上海地方历史研究,我与我的同仁们也均以“至元二十九年”,即公元 1292 年为上海建县日期,这应该是一个定论,但就在 1991 年或再早一年,有人提出上海建县为“至元二十八年”,即 1291 年的“高调”,唱此“高调”的“功利主义”十分强烈,因为 1991 年是辛亥革命八十周年纪念日,又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年,如加上一个上海建城七百周年纪念年,一年中逢三个大庆日,那一定闹猛多了,欢庆多了,也真的没想到,这个尚无确凿依据的建城时间也被喜欢闹猛的人接受了——这就是“上海建城年代”出笼的真正原因,但闹猛过后,留下的后遗症太多太多,20 世纪 90